

历史的选择 与 选择的历史

吴金水 郑元康 张应杭 主编

浙江大学出版社

历史的选择与 选择的历史

吴金水 郑元康 张应杭 主编

浙江教育出版社

(浙)新登字 10 号

历史的选择与选择的历史

吴金水 郑元康 张应杭 主编

责任编辑 陈振亚

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

浙江大学出版社计算机中心排版

德清第二印刷厂印刷

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9.25 字数 232 千

1992年6月第1版 1992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2000

ISBN 7-308-00974-2/C·092 定价：2.75 元

目 录

前 言.....	1
一 时代的主题和理论的成熟	
——社会主义理论在中国的兴起和传播.....	7
(一)摆脱困惑的企盼:社会主义思潮在近代中国的影响	7
(二)转换时代的播火: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	15
(三)理论成熟的关键: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实践.....	24
二 历史的探索与主题的偏离	
——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的幻灭	33
(一)近代中国资本主义建国方案的可悲命运	33
(二)“全盘西化”思潮面面观	45
三 历史指向的把握及其理论超越	
——共产党对社会道路的选择与创造	62
(一)对近代中国历史发展进程的把握与理论的选择	63

(二)对近代中国国情指向的把握与理论的选择	72
(三)创造与超越	81
(四)从历史和思想深处走来	93
四 富有生机的新型建构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	97
(一)面对历史的理性审视	97
(二)面对现实的理性思索	110
(三)面对未来的理性完善	129
五 历史的见证	
——正确认识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	132
(一)怎样正确认识与评介一种社会制度的优越性	133
(二)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显示	136
(三)有关社会主义优越性的若干认识问题	147
六 强国之路	
——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	165
(一)改革是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和发展	166
(二)开放是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	175
(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搞好改革开放	185
七 严峻的现实与思考	
——社会主义在曲折中前进	192
(一)困难和曲折:社会主义在当代的境遇	192
(二)历史与现实: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和思考	196

(三)希望和前景:社会主义必将越过曲折最终取代资本主义.....	203
八 理想与幻想的错位	
——对民主社会主义的剖析.....	208
(一)民主社会主义的历史轨迹.....	208
(二)民主社会主义的虚幻性与欺骗性.....	214
(三)民主社会主义的危害.....	222
九 扬帆前进	
——坚定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路.....	228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学内涵.....	228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哲学审视.....	236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我们的必由之路.....	242
十 面对历史与现实的必然选择	
——这一代大学生的思考和行动.....	253
(一)“天下大势”与我们的思考.....	253
(二)“自我设计”:社会主义人生理想的建构	264
(三)共和国的嘱托和希望;在实现社会主义理想和行动中获得自我价值.....	276
结束语.....	286
后 记.....	289

前　　言

在进入本世纪最后 10 年的历程中，在人类为迎接新世纪的到来而进行各种预测的时刻，曾经改写了人类历史，并给这个世界带来蓬勃生机的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挫折。

于是，我们听到了来自资本主义世界幸灾乐祸的笑声。布热津斯基写下了《大失败——20 世纪共产主义的兴亡》；尼克松有了《1999：不战而胜》；现任美国总统布什则更断言：我本人是两种制度历史性较量走向结束的历史见证人。

“高天滚滚寒流急”。有人困惑，有人疑虑，有人思考。正是在这一国际大背景下，我们的一份来自大学校园的调查表明，青年学生对社会主义的困惑、疑虑、思考，可以归结为如下两个最基本的问题：第一，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否还是世界历史发展的大趋势。第二，社会主义是否依然是当代中国历史与现实的必然选择？

也正是置于这样的国际大背景下，我们结合高校青年学生的思潮认识实际，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与现实必然性问题进行理论上再探讨，以有助于解决学生中存

在的深层次思想认识问题。同时,这也作为我们——一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一批对社会主义制度充满信心的理论工作者,以自己的理性和思考交给时代的一份答卷。其贯穿始终的基本结论,即: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

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世界历史的大趋势,马克思在理论上论证了这一真理,20世纪的世界历史在自己的实践中也证明了这一真理。但是,和任何事物的发展都必然要经历自己艰难曲折的历程一样,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过程也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它要受到资本主义及一切腐朽没落的反动势力的阻止与演变。正因此,在这一历史进程中,一个时期,社会主义凯歌高奏,而资本主义危机四起;一个时期,社会主义遇到困难和曲折,甚至是严重的挫折,资本主义却取得暂时的稳定和发展。这是正常的历史现象,这是历史发展的客观辩证法。把握这一点,可以说是我们如何理解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历史必然性和历史命运的社会认识论前提。

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历了40多年风风雨雨的历程。在这期间,一个最基本的事实是,中国社会发生了举世瞩目的变化:一个极度贫穷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旧中国已经变成了一个初步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新中国。这一基本事实所蕴含的意义是深远的,它深刻地证明了我们在本书中要阐述的一个基本思想: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和发展中国。

是的,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在前进的过程中也发生过失误,甚至经历过文化大革命那样的失误。但是,能否因此说,中国选择社会主义不是一种历史与现实的必然,而只是一场所谓的“历史的误会”呢?如果说,在1989年北京发生反革命暴乱时,中国人民经历了血与火的考验之后,对这一问题重新获得了明确的答案的话,那么,我们可以说,当前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国

家的政局动荡甚至剧烈演变，国际共运面临严重挫折的局势，对于国门洞开的中国，又一次面临着这样一个严峻的问题：社会主义是否依然是当代中国历史与现实的必然选择？对这一问题的回答直接关系到我们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兴衰成败。

我们对这一问题思考的逻辑既源于当代青年学生的思想认识实际，又遵循着社会主义在中国发展的客观历史进程。我们在本书中围绕如下三个方面进行了理性探寻：

1. 通过中国近代史的回顾，深刻地阐述旧中国为什么没有选择资本主义，而是选择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

众所周知，自鸦片战争以后，灾难深重的旧中国在不断的丧权辱国、割地赔款中，逐渐地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这事实上已经宣告了封建统治的破产。于是，正如毛泽东指出的那样：“要救国，只有维新，只有学外国，那时的外国只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是进步的，他们成功地建设了资产阶级的现代国家。”^①但是，历史的事实是，太平天国被中外反动势力绞杀；戊戌变法犹如昙花一现；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皇朝的统治，但建立的民国却虚有其名，随之而来的是“城头变换大王旗”（鲁迅语）的军阀统治。中国并未成为一个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

正当先进的中国人陷于彷徨和苦闷之际，在资本主义故乡却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由大战带来的资本主义文化危机笼罩着整个西方社会，而中国的近邻俄国却发生了社会主义的十月革命。十月革命是在马克思主义思想指导下发生的，而且发生在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均同旧中国极为接近的俄国。因而它使先进的中国人又一次放眼世界。如果说近代中国 80 年历史，中国人选择了资本主义，然最终归于失败的话，那么，大战引起

^① 《毛泽东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版，第 1470 页。

的资本主义文化危机，以及十月革命的胜利，作为一种历史的力量，将正处在又一次选择关头的中国，推向了社会主义。

所以，在中国革命取得胜利之际，毛泽东曾作过如下深刻的总结：“就是这样，西方资产阶级的文明，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在中国人民的心中，一齐破了产。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让位给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主义。”^①这无疑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为了民族图强振兴而进行英勇斗争历史的精辟概括和总结。

2. 以科学的比较方法，论述中国选择社会主义制度所具有的无比优越性。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因而，中国走上社会主义这40多年的实践结果究竟怎样的问题，是社会主义在中国是否具有必然性的最根本表征。要探讨这个问题无疑要进行比较，因为有比较才有鉴别，但这种比较又必须是科学的。列宁曾这样讲过：“进行这种比较必须适当，这里有一个起码的条件，就是弄清楚拿来比较的各个国家的历史发展是否可以比较。”西方资本主义已经历了三四百年的发展，而我们社会主义才只有短短40几年，我们如果仅从物质生产和国民生活水平方面的这个差距，就得得出资本主义要优于社会主义，因而中国选择社会主义错了的结论，无疑是非科学的，也是难以使人信服的。

其实，中国40多年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是举世瞩目的。在新中国建立前夕，美国有人就预言：中国共产党解决不了中国人吃饭的问题，总有一天要依靠美国的经济援助。但是，我们用自己的努力不仅打破了这种预言，而且使我们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诸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这无可置疑的事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71页。

实表明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具有不可比拟的优越性。

3. 社会主义正在改革开放中不断地自我完善和自我发展，中国人民正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满怀信心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社会依然存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而改革正是解决这一矛盾的最基本方式。马克思、恩格斯说：“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其它任何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① 而对外开放，则是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自我发展的必由之路。因为世界性的大规模的经常的国际经济交往，是社会化大生产的必然要求。社会主义国家为了适应这一社会化大生产的需要，更加必须对外开放。

中国 10 年改革开放的成就是举世瞩目的。尤其具有讽刺意义的是，美国布热津斯基在 1989 年出版的《大失败——20 世纪共产主义的兴亡》这样一部书中，也不得不承认“到 80 年代中期，中国沿海地区的经济和生产率出现了一次飞跃，这一地区的城市也发生了明显的和振奋人心的变化，1978 年至今，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已经翻了一番”。

的确，10 年改革开放的成就，使我们拥有了成就显著的 80 年代，不仅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而且经受住了国内外风浪的严峻考验，并为继续前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一切无疑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把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坚定不移地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取得的。这一事实再一次雄辩地证明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和发展中国这一颠扑不破的真理。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7 卷，第 443 页。

这就是我们的思考。这就是我们的探讨，这就是我们的结论。

可以肯定地说，任何的理论思考都是以实践作为其最终指向的，因而，我们对中国社会主义的历史与现实的必然性思考也是以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这一伟大实践为根本目的的。正如《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10 年规划和“八五”计划建议》所指出的那样，在本世纪最后的 10 年，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是极其关键的 10 年。显然，在这个进程中，挑战与机遇并存，发展与困难交织，因而，我们需要振奋精神，去开创未来。

是的，未来无疑是属于我们这一代青年人的。但正如昨天的未来已变成今天的现实那样，明天和未来正是从今天的现实起步的。因而，我们需要对当今中国的现实进行深沉的理性思考。如果我们只是任性地凭感觉在生存，而不愿以理性和思考来充实自我的生命，那末，我们又以什么去把握未来呢？

愿我们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历史与现实的必然性思考，对我们的青年学生是一种新的启迪，新的鼓舞，新的召唤。

— 时代的主题和理论的成熟 ——社会主义理论在中国的兴起和传播

社会主义由思想的传播,到理论上的实践和运动的深入展开,进而发展为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社会主义思想进入中国,并得以广泛传播,是历史形成的、具有中国独特的发展过程。中国人对社会主义思想的了解、传播到理论的成熟,是逐步的、渐进的。中国先进分子在介绍和传播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受到时代、本国条件和介绍者(传播者)自身立场态度的限制,几经曲折和错位,终于在中国社会发展的基础上,在具备了接受社会主义的土壤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条件前提下,通过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努力,得到了广泛的传播;继而在共产主义战士前赴后继不懈地进行社会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理论实践过程中,把社会主义运动与中国国情结合起来,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伟大胜利,建立了社会主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一) 摆脱困惑的企盼： 社会主义思潮在近代中国的影响

中国曾以自己的智慧创造了灿烂辉煌的文化,也曾以自己的勤奋创造了繁荣和发达。但是,历代王朝为了形成一个完整无

缺的封建统治，一次又一次地对中国社会经济、文化与政治作整合，致使封建王权思想和君主专制制度绵延 2000 多年。中国社会长期陷于传统的整合力量控制之下，统治层执迷于上承祖宗典章，下治王朝纲纪；被统治者安于以家庭为单位的农业和小手工业相结合的社会生产方式，满足于男耕女织孤立、封闭和和谐的社会生活，中国社会呈现的是僵化和停滞。然而，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深层矛盾的运动是任何力量无法阻止的。社会内部矛盾的日益显现，反映了中国封建社会日渐走向穷途末路。魏源、冯桂芬、龚自珍等封建社会上层的改良派，首先感到困惑，率先要求整治腐朽之极的封建官僚体系。尽管他们的主张是用缓和的渐进的办法，对封建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作点滴改良，并无实质的变革内容，也不可能跳出封建正统纲常，但触及了封建社会的黑暗现实，拨动了叛逆纲常之音，给考察中国社会的历史走向者以启迪。

当中国社会还未搞清是否能靠自身力量摆脱矛盾、困惑之际，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和世界一体化发展的总趋势，已经不允许称雄于地球东方的中国置身于此之外。1840 年，西方列强，以其坚船利炮轰开了中国古老的大门，中国陷入亘古未有过的混乱和动荡之中。“天朝大国”这个庞然大物，竟是个不堪一击的空架子。对外失败的迷惘和伦理纲常的心态不平衡交织在一起，致使中华民族对自己进行思考和反省。求进步的中国人敏捷地把自己的目光投向了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文化，企盼自由、理性与民主在中国的实现，以收社会和政治制度变革的效应。然而，学生一次次执著的追求和学习，换来的却是一次挨先生的打和屈辱。中国的先进分子，在社会内部矛盾和西方文明双重冲击下，继续寻追新道理，为中国社会找出路。这是中国早期引进社会主义思潮的契机。

社会主义早在 16 世纪已在欧洲随着资本主义的产生、发展而兴起,到 19 世纪 40 年代,由马克思、恩格斯等完成了社会主义由空想到科学的飞跃。然而,社会主义对中国来说,却是一种崭新的社会思潮,吸引着各方人士的关注。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先进的知识分子在钻研达尔文的进化论、卢梭的天赋人权论等资产阶级启蒙思想时,也接触到社会主义思潮,并开始介绍。介绍者只是把马克思及其社会主义学说,作为西方的一种新道理,与西方各种社会思潮笼而统之一起介绍,根本不知社会主义有繁杂的流派。何况,介绍者本身的身份也决定了他们不可能掌握科学社会主义的真谛;不可能看到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还是空想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或是打着社会主义旗号的第二国际鼓吹的社会改良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之间存在着本质的区别,当然,更谈不上把马克思及其学说作为本国革命的指导思想来推崇。他们的全部精力仍然关注着西方资本主义的一切,要学习引进的仍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对马克思及其学说只是顺便的介绍。从历史的分析,这也很难责怪他们,因为国内革命的基础处于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革命期。因此,事实上,他们这些零星的、片面的,只要不是有意歪曲的介绍,都或多或少对中国早期进步知识分子了解社会主义有过一定的启蒙作用。如 1902 年 4 月,上海广智书局出版的日本社会主义研究会会长村井知至著、罗大雄翻译的《社会主义》一书,第一次把马克思译为卡尔·马克思,论述了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指出:资本家有资本就“建大工场,养尊处优,坐至巨利。劳动者乃日困苦于此工场中,日为资本家生利”,“劳动者之所得,仅工资耳”,“其余利益(即指剩余价值)莫不为资本家之垄断”。说社会主义“意在变资本之私有为共有,则少数者无垄断之私利”。又如,1903 年 10 月,《浙江潮》编辑所出版的,由中国识达译社翻译、日本人

幸德秋水写的《社会主义神髓》一书，对马克思及共产主义作了较全面的介绍，表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一些主要思想，说：“实行社会主义的大革命”，“是实科学的命令，历史的要求，进化的理法，吾人虽欲避之，而无可避者也”。

审视早期介绍马克思及其社会主义学说的代表人物，构成十分复杂，有外国在中国的传教士，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资产阶级革命派、无政府主义者和政治投机分子。他们大多数是从各自的政治目的和阶级立场出发来介绍社会主义。

在中国，最早提到马克思及其学说的是 1899 年 2 月出版的《万国公报》^①。该刊发表了英国基督教（新教）传教士李提摩太题目为《大同学》的文章。这是一篇沿用当时欧美把正在流行的各派社会主义，统称为“大同学”、“安民新学”、“养民学”而命题的文章。它出于害怕西方正在掀起的无产阶级以马克思学说指导的革命运动波及中国，故而把社会主义也当作人道主义救世学派的一种加以介绍。说“试稽近世学派，有讲求安民新学之一家，如德国之马客思（即马克思），主于资本者也（即指马克思对资本的研究）。”继而又说“养民学者（指马克思）”局限于“贫富之相争”问题上，而忘记了“世人历代之讲道德”，只有基督教是从道德这个根本问题着手“养民”。从此不难看出，李提摩太不仅不可能正确介绍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而且，意在宣扬只有依靠基督教才能真正“养民”，为其殖民主义政策辩护。

资产阶级改良派梁启超是向西方学习颇有影响的人物。他在戊戌变法失败后，逃亡日本时，创办了《清议报》、《新民丛报》，并大量的撰写文章，当然，主要是宣传资产阶级社会的政治、思想、文化道德的文章，也兼介绍马克思及其学说，对马克思及其

^① 《万国公报》是英国传教士韦廉士于 1887 年在上海创办的中文刊物。

学说说过些赞美的话。如 1902 年,他在《新民丛报》第 18 号上,发表的《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一文中说马克思是“社会主义之泰斗也”。又说马克思之社会主义是德国“最占势力”的思想,还说社会主义“为将来世界最高尚美妙之主义”。其实,他并不真正理解科学社会主义。1904 年 2 月,他在《新民丛报》第 46 至 48 号上,发表的《中国之社会主义》一文说:“社会主义者,近百年来世界之特产物也。概括其最要之义不过曰:土地归公,资本归公,专以劳力为百物价值之源泉。”甚至把科学社会主义与中国古代的井田制混为一谈,说“中国古代井田制度正与近世之社会主义同一立脚点”。梁启超在政治上是顽固坚持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他在 1906 年《杂答某报》一文中,把马克思社会主义学说说成是“架空理想”,只“足以煽动下流”。他一心一意鼓吹君主立宪制,根本不打算在中国实行社会主义,后来成了最早反对马克思学说的人物。他说:中国“民族主义尚不暇及,何论于社会主义大同理想哉? 曰,吾明知不能臻之大同,而实欲立大同之基也。立大同之基者何? 曰,在迫朝廷改专制政体而为立宪政体”。他明确表示,中国现在和将来均不宜实行社会主义,而“宜酌采社会改良主义”,说凡“社会主义学说,其属改良主义者,吾固绝对表同情;其关于革命主义者,则吾未始不赞美之,而谓其必不可行,即行亦在千数百年后。”^① 这番议论道出实情,他之介绍马克思及社会主义学说,意在以西方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事实,向清王朝施加压力,逼其下诏改行君主立宪政体,为其推行改良主义开辟道路。

20 世纪初,资产阶级革命派,在与改良派辩论时,也开始介绍马克思及其学说。当时资产阶级革命派的一些主要人物几乎

^① 梁启超:《驳孙文演说中关于社会革命论者》,《新民丛报》第 86 号。